

“十号会议室”特约评论精选

本期推荐作品：罗伟章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

大河小说的“经”
与个体叙事的“纬”

□刘小波

罗伟章的《谁在敲门》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“大河小说”。体例上,小说字数多、篇幅长、体量大;内容上,时间跨度大、涉及人物多、故事线索广,总体上显得芜杂而磅礴。此外,作家还在小说中思索时代、历史、文明、现代性以及生死之大事,主题也显得宏大厚重,具有“大河小说”的典型品格。但《谁在敲门》又溢出了“大河小说”的范畴,落笔于世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,以普通家族叙事为轴心,关注个体的命运,显现出典型的个体化叙事特征。大河小说的“经”与个体叙事的“纬”,共同编织起一幅个体与时代共振的画卷。

《谁在敲门》是罗伟章多年来小说创作的集成之作。微观层面,作家书写普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,聚焦于个体;中观层面,作家强调时代由一个个人组成,书写了时代的浪潮;宏观层面,则由现实生活上升到精神世界,思考“形而上”的议题,探讨生命与存在等问题。

《谁在敲门》首先是一部聚焦个体的作品。作品涉及众多的人物,既有整个许氏家族的几代人,也有通过许家人彼此交际而引出的具有关联的其他人。核心人物许家父亲是典型的“中国式父亲”的缩影。父亲在中年丧偶之后,一个人将七个子女拉扯大,可无论他怎样努力,毕竟能力有限,总被人挑出毛病,在生活艰难的年代,不得已将第七个孩子送人。而他自身也有很多传统农民固有的特性,比如任劳任怨、勤俭节约的优点,絮叨、固执、胆怯的缺点,抑或是作品多次提及的他关心生存能力较差的“么儿子”落得偏心的形象,都十分真实。母亲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刻画,但在零星的书写中也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。第二代人当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生存路径。大姐具有“泼辣”的外表,却是典型的慈母性格,对家人关怀备至,对生活忍辱负重,最后自杀身亡。大姐夫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能人,左右逢源,在地方上可谓“手眼通天”,还两度入狱。其他人中,有一辈子被儿子拴住的大哥,有着狡黠自私、迫于生活压力极度自保的许家老二。老三,也就是小说叙述者,也是一个被生活压迫的普通人,虽然在城市里立了足,但是无力改变许多事情。第三代人则是完全脱离了土地的一群漂浮的人,这些人依靠父辈关系串联起来。

《谁在敲门》是关注现实的作品,小说锁定在亲人遭遇疾病这样一件当下不可谓不棘手之事件。通过对生病老人的照料,延伸到家庭伦理书写以及父辈与子辈关系的深度思考,其个体叙事也进一步明晰化。多种细节描写展现了底层生活的现状,比如有兄弟在医院看望父亲的同时,还要出门揽活,生存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。各种为了蝇头小利、鸡毛蒜皮而引发的肚皮官司更是层出不穷。

《谁在敲门》虽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,但由于聚焦个体,其切口较小,整部作品仅仅围绕三个核心事件展开,一是为父亲庆祝生日,二是父亲生病住院,三是父亲的葬礼。正是这三件事,铺陈出了六十余万字的篇幅。在描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,除了书写许氏家族人的动态,牵扯出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,还引出其他很多人,书写的內容更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,构成了一幅乡土社会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《谁在敲门》涉及内容众多,教育、医疗、拆迁、扫黑除恶、扶贫、城市化浪潮等很多现实问题都有所体现。人物与风物构成了写作的主体,延续了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。

在《谁在敲门》中,“大河小说”的这一特性集中在“时代”这一关键词,从题记开始就已经凸显出来,并多次回到这一点上。罗伟章强调个体,更强调时代,时代因个体的累积而存在,个体也在时代的震荡中而存在。现实关怀上面,父亲在医院住院的描写中也指向时代,以父亲为中心,涉及多个家庭、多位病人的书写,从一个家庭的疾病问题,到整个社会医疗问题的思考,虽然兄弟姊妹们都带着较为优越甚至是富足的生活,但是面对重大疾病这样的问题时,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,原因仍要归结为经济实力的不允许。乡土社会的各种特殊伦理、固有风俗,譬如对么儿的过分宠爱、兄弟之间的不和、女性所遭遇的家庭暴力、老人赡养问题等等,都指向时代症候本身。

对时代的书写,集中在乡土社会的解体和城市化进程这方面,这一主题在罗伟章的很多作品中都已经表达过了。《谁在敲门》书写的是几十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。透过时代的描摹,营造出对乡土期望逃离又无法彻底割裂的一种复杂心绪。年轻一代的人们都渴望进入都市,摆脱乡土的束缚,但是总有亲人在故乡,自己的根始终在那里。《谁在敲门》中,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之下,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已走向瓦解,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乡村伦理道德也走向瓦解与重构,许家的后代们相继进城谋生,土地荒芜、村庄破败,一种乡土的解体迎面而来,几代农民子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。

同时,《谁在敲门》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特



色的小说,整部作品巴蜀风味浓郁,地方风貌、方言的使用,以及特色饮食,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性。历史的影子也始终若隐若现,作家对时代有一种历史化的描摹,用史学家的笔法在创作小说。除了时代和历史,小说也涉及一些关于文明、文化、善恶、生死等问题的思索,虽然具有“清淡”的意味,但也是宏大层面的直接体现。

罗伟章在作品中关注了个体和时代之外,还有更多“形而上”的思考。很多内容其实与小说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系,但是作家仍用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来进行讨论,很多时候,作者都要站出来讨论事件本身,无论是身份的设定还是故事情节,都有这方面的思索。比如罗伟章在小说中深入讨论了生与死的辩证,在小说中,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书写中,大量的笔墨有关于死亡,以此探寻一种终极的命题:生与死。

罗伟章是一个反思型作家,一直在探寻写作的“小径”,经常将笔触伸向那些隐秘而阴暗的角落,尤其是擅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,小说不断出现作者的观点披露,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古老手法,有一种“微言大义”的味道,在不动声色中将很多问题直陈出来。

《谁在敲门》如此庞大的体量,其小细节的处理却是绝对值得注意的。《谁在敲门》是一部发散性的作品,不断牵出新的线头,时时另起炉灶,书写与主线不太相关的故事情节,但是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处理。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,《谁在敲门》都十分注重细节的精雕细琢,每一次讲述都事无巨细,无所遗漏。细节的成功让这部作品没有陷入因冗长而带来的干瘪枯燥,比如关于风景的描写在细节处理上就很到位。小说还有很多超现实的细节,比如梦里吃药治好了顽疾、犯忌语遭到报应。凡此种种,都体现出了小说宏大而注重细节的一面。

时代的大潮与个体的生存交相辉映,大河小说与个体叙述构成了作品的“经纬”。《谁在敲门》描摹时代带给个体的冲击,书写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父辈与子女的关系,以此作为引子,接续到时代的书写,将个体、时代和哲思融为一体,“大河小说”的气质和品格,个体叙事的细节雕琢,宏大与细腻的交织,最终显现出“大河小说”与个体叙事的“经纬”辩证。

(刘小波,四川广元人,博士后,《当代文坛》编辑部主任,副编审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获马识途文学奖、“啄木鸟杯”年度推优等奖励。)

慢镜头下的文明巨变

□李静

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,给人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其厚重的体量。63万字,近700页,密密麻麻的文字你追我赶,共同走向这个浮躁时代的反面。正如罗伟章在新书推荐词中所说:“时间太快,太匆忙。我要让它慢下来,还原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舒缓和宽阔。在热闹喧嚣当中,我们主动地、被动地丢弃了太多的东西。……那些东西用触目惊心的方式,让我们重新发现、捡拾、擦亮,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重新归于完整。”那么这本致力于恢复舒缓与宽阔的“慢小说”,到底发现、捡拾和擦亮了哪些东西呢?

“真正惊心的,都很普通和日常”,小说接近尾声时抛出的这句话道出了基调与关切所在。全书共分七章,书写的都是最日常不过却又惊心动魄的内容:许家老父亲生日(第一、二章),父亲生病住院(第三章),父亲葬礼(第四、五章),葬礼后亲友远离故土的人生走向(第六、七章)。生老病死,聚散凋零,故事的展开行云流水,仿佛暗合自然节律,几无斧凿痕迹。这印证了作者后记中的自述,他的写作不靠提纲,而是下一句踩着上一句的尾巴,自然流淌而成。其实小说的语言是非常精细的,多用短句,虽有方言的生动却毫不俗气,时有原创性的表达却又并不显造作,这些无疑都离不开精雕细琢的功夫。而这种精致感与自然感并行不悖的奥妙,源自作者对实际生活的精准观察,也来自他对自身经历的高度重视。

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罗伟章为何选择以第一人“我”,亦即许家三子的视角展开叙述。因为第一人方便他更直接地传递个人经验,更彻底地掏出内心的纠结。回顾他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,对第一人称的偏好始终未变。这与他的写作高度依赖生活经验是很有关系的,在2019年的访谈中,他坦言“我本身就构成现实”。具体到这本小说来说,写下第一行字的契机来自作者下派川西芦山期间,而写下去的动力,源自一首少数民

出于大力推荐优秀作品的考虑,中国作家网特开设“十号会议室”栏目,聚焦那些或受到广泛关注、或仍未被充分重视的文学新作,约请中青年作家、评论家参与评点,集特约评论、新闻动态、作品访谈、创作心路等相关信息于一体,与读者一道展开阅读与探讨,力求以丰富角度全面呈现作品的魅力。2021年9月总第一期,我们为大家推荐了罗伟章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,让我们一起思考,面对传统与时代的敲门声,个人该如何应对与选择?以下精选专题中的三篇特约评论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族民歌搅动的情愫——“我心里或许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”“最深的寂寥,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”。“我心中的寂寥的欢歌”,需要第一人称来承担,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,以“局内人”的视角表达与故乡、与传统、与时代的复杂关联。费孝通曾在《乡土中国》里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“差序结构”,亦即以“己”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结构,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。用在此处,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由第一人称所“推出去”的,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一群人的故事。

同样延续了罗伟章创作的一贯特点,小说中的“我”仍是出生于乡村的知识分子。“我”是在省城画报社工作的编辑兼诗人。因此“我”的返乡,串联起省、市、县、镇、村等多个层级,牵扯出城乡互动时的碰撞。与鲁迅百年前所作的《故乡》不同,小说中的“我”非但做不了启蒙者,反而是无力回馈故土的无能者。因为知识,尤其是他的诗句,并不能带给故乡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。小说里直白地写道:“自己没能力给故乡一点几实实在在的脉路。葬礼之后,六、七章突然加速,一泻千里,交代了众多人物的走向。子孙一代四散各地,“我”这一代也因为拆迁,被动搬离故乡。全书的精华更多地集中于缓慢的前五章,节奏加快的后两章更多地充满了宿命感,更多地抒发了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面前的情绪体验,因而较之前五章显得单薄一些。

不难看出,罗伟章是自觉在城市化、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写作的。书名“谁在敲门”,可以被理解为外部世界的闯入,而门内之人必须承受突然降临的命运。这意味着变化,宣告着下一个阶段的到来。他的写作充满了地域色彩,即便某些段落落在历史中还不是那么圆融,也无疑为整部小说奠定了行文厚度与文明视野。作者在后记中坦言,“《饥饿百年》是山的文明,《谁在敲门》是河的文明。山河这个词,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——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。”“每个时代下的人们,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。”可见,他是从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眼光里来审视与记录故乡的。他的写作固然扎根于最熟悉的故乡,具有不容忽视的地域色彩。但其内里的创作冲动,是靠对时代命运的关注来驱动的。正是在时代滚滚向前的必然性面前,小说中孱弱的、被忽视的“文化”,那些不被珍视的“诗句”,反倒借由小说的行进,柔弱地伸张着自身的意义。这里的意义并非妄图抵挡必然性的铁轮,而是将文学作为同路人,分担自己的命运。那些准确细腻而又缓慢的语言文字,就是意义本身。把时间变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,文明巨变中的个人才显得那样鲜活饱满,那样有尊严与有价值。令人欣慰的是,《谁在敲门》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机会。

(李静,北京大学文学博士,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,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化现象,已出版专著《更新自我: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》。)

写满两章。所以我们看到,因着父亲到大姐家过生日,门里门外,许家四代悉数登场,各自的生命故事也摇摇曳曳地展开,彼此间的关系也被一一交代。那种亲人之间才懂的动作、语调、敏感词,被恰如其分地拿捏。亲人间远不止温情脉脉的一面,而且更了解彼此的不堪和隐忧,更容易被索取与依赖,因而亲人的聚会也不啻于“高危地带”了。

生日之后便迎来死亡,生死不过门里门外的一线之隔。关于葬礼,同样写满了两章篇幅,展示了敬鬼神、重生死的“乡村知识系统”。阴阳先生刘显文根据八卦命理推定出破土下葬的黄道吉日,算起来父亲要在家中待九天。而这九天中有许多事项需要完成:建灵塔、搭灵棚、抬冰棺、烧棺、做法事、哭唱祭文等等。这些事项都被详细刻画,见证了死者最后的热闹。热闹到极点,便是分离的开始:“多少家庭的结,几年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地困着,往往在父母的丧事期间,就爆发出来。”而小说中对于如何分礼金的描写,露骨而接地气,让人愈发看清了大家族“分家”的脉络。葬礼之后的六、七章突然加速,一泻千里,交代了众多人物的走向。子孙一代四散各地,“我”这一代也因为拆迁,被动搬离故乡。全书的精华更多地集中于缓慢的前五章,节奏加快的后两章更多地充满了宿命感,更多地抒发了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面前的情绪体验,因而较之前五章显得单薄一些。

不难看出,罗伟章是自觉在城市化、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写作的。书名“谁在敲门”,可以被理解为外部世界的闯入,而门内之人必须承受突然降临的命运。这意味着变化,宣告着下一个阶段的到来。他的写作充满了地域色彩,即便某些段落落在历史中还不是那么圆融,也无疑为整部小说奠定了行文厚度与文明视野。作者在后记中坦言,“《饥饿百年》是山的文明,《谁在敲门》是河的文明。山河这个词,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——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。”“每个时代下的人们,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。”可见,他是从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眼光里来审视与记录故乡的。他的写作固然扎根于最熟悉的故乡,具有不容忽视的地域色彩。但其内里的创作冲动,是靠对时代命运的关注来驱动的。正是在时代滚滚向前的必然性面前,小说中孱弱的、被忽视的“文化”,那些不被珍视的“诗句”,反倒借由小说的行进,柔弱地伸张着自身的意义。这里的意义并非妄图抵挡必然性的铁轮,而是将文学作为同路人,分担自己的命运。那些准确细腻而又缓慢的语言文字,就是意义本身。把时间变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,文明巨变中的个人才显得那样鲜活饱满,那样有尊严与有价值。令人欣慰的是,《谁在敲门》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机会。

(李静,北京大学文学博士,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,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化现象,已出版专著《更新自我: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》。)

被暗物质包裹的小星球

□马林雷梦

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具有强烈的社会性,故事脉络立足现实,但却超越了一般的现实描写,呈现出迷人的“众生相”式的特质,体现了作家向生活纵深处挺进的气魄。同时,小说没有概念化地讨论生死、代际与家庭伦理的问题,而是以“父亲的去世”为切入点,探索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普遍精神困境,使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现代寓言。

精神的饥饿:百景图式的世情叙事

人类对寻根有种发乎本能的责任感,沿着现在的生活探访过去,群体行为都有其历史根源。生命最根本的痛苦来源于精神的饥饿,而这种精神饥饿带来的孤独感,使得人类与其生存环境、包括周围人的关系更加紧张。当一部作品试图探讨类似的大命题时,一段固定的时空和有限的人物难以全面呈现主题。于是《谁在敲门》选择了百景图式的世情叙事,在多人物背景、多个场景转换的铺陈、转移、对照下,许家三代人的生活史、情感史、命运史跃然纸上,呈现了农村生活百态,也写尽了天地当中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。叙述静水流深,人生百态波涛暗涌,一地鸡毛跃然纸上。“第一批老人在山里去世了。父母的坟头长着这里的荒草,父母的尸骨肥着这里的土地,这里就是他们的家。”故事发生的场所由点到面、由内向外,人物的命运与时空的转换统一在小说的叙述中,使作品的艺术表达更具效力。



《谁在敲门》中,在母亲去世后的日子,父亲满怀着愧疚艰难度日,以至于母亲老去的瞬间成了父亲生命最后的定格。父亲的生命消逝之际,正是揭开许家疮疤的时刻:儿女的推诿、兄弟的博弈、父亲的沉默不语,一众人物隐藏在外表下的自我,被作家认真又无情地揭露。罗伟章是写人性的能手,具有洞析世事的眼光,准确地描摹出人性的冲动以及潜意识活动如何运用她的魔力,使人在情感欲望驱使下遭际自己的命运。

“痛苦不是根源,根源是人生。”

生而为人,面对亲人的故去,我们该如何面对接踵而至的内心恐惧与世俗争议?罗伟章是一位非常重视真实体验的作家。在他看来,把真实的体验表达出来就是写作。罗伟章特殊的成长经历,让他体验过饥饿的苦难。创痛不仅是生理上的,心理记忆和情感记忆也会延续这种生理感受。苦难与悲悯、故乡与远方、个人与时代、理想与世俗,在作家笔下纠结缠绕,“痛苦是肮脏的,病和老,是痛苦的原因,却不是根源,根源是人生”,个人成长体验中的每一个缺失、失恋、失意、失望、虚弱病痛、乃至生死,都是芦苇与宿命的正面对抗。而人生永远无法逃脱的魔咒——死亡这个既是困境又是解脱、既是问题又是答案的潘多拉之盒,却在许家三代人的故事里沾染上一种近乎超脱的悲悯色彩。

时间是单向、匀速流动着的,这导致了处在其中的生命必然衰朽、死亡的命运,也造成了人类对于生命天然的悲剧感。这不只是《谁在敲门》的谚语,也是历史和现实的隐喻。通过对告别的强调和书写,一方面反映了生命的真实,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家对尝试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探索。

不自由的身体和逃离的灵魂

海德格尔说,“我知道,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,都源于这一个事实:人有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传统。”对原乡的追寻、对传统的回归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。在家国一体的传统文化文化大架构下,家的概念不仅是规范亲密关系的重要准则,其所承载的出生意义更是不可被遗忘的。《谁在敲门》中的重要意象,就是把城市与乡村、过去与现在、现代性与传统、他者与自我这几对矛盾编织在一起,展现了作者对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文明困境的思索。小说寻找主体意义的过程,其实也是一次精神返乡的旅程,是一个逐渐消融进公共世界的个体对往昔岁月的追忆,也是一场自我救赎。

作家在酣畅绵密的故事中,埋下了另一个更深的叩问:谁在敲门?面对这阵急促强悍的敲门声,在门背后的我们,又该如何在不自由的身体和逃离的灵魂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喘息之地?在罗伟章笔下,父亲的逝去不仅代表生命消亡,也象征着旧时代的落幕。

不难看出,罗伟章的创作始终保持对世界的高度敏感,以及对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而疼痛的审视。他不仅执著书写人的存在,更直面生长于大地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,展示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图景。罗伟章的小说在探索社会问题和靠近人性真相的同时,不吝为故事寓于深刻的批判和反思,这不仅帮助其创作逐渐回归文学的本质,更是他写作的精神维度与命意所在。

时代是由一群人共同书写的。在每一个时代,“离去”都是现实,然而“存在”并不改变,正如小说后记中写到的:“前方和更前方,是生命唯一的方向。我们的歌哭悲欣,证明了我们在朝着那方向认真生活。”面对世间一切不可抗拒,我们或许如同被暗物质包裹的星球。万千星球汇聚成无穷宇宙,犹如一滴滴水汇成大海,正是个人与时代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。这是作家在书中提出的问题,也是他给出的答案。

(马林雷梦,1991年生于北京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,同时撰写书评及专栏。)



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
www.chinawriter.com.cn
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